

周敦颐《通书》的思想价值

□ 姜喜任

周敦颐这个名字之所以会被大家记住，首先是因为他的名篇《爱莲说》。实际上，周敦颐不仅是《爱莲说》的作者，更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位居“北宋五子”之首，世称濂溪先生。《宋史·道学传》在谈及两宋理学的发端时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意思是说，孔孟之后，汉唐千余年的儒学全是章句训诂的传经之学，对于孔孟心法毫无了解，直至北宋周敦颐出世才跨越汉唐直接承继孔孟之绝学，重新阐发儒学的阴阳五行之理和天道性命之妙。周敦颐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中，历史上对《太极图说》的争议较多，但对《通书》的评价却一直很高，因而《通书》实际上是周敦颐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周敦颐著作最早最权威的记载，见于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所作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说周敦颐特别擅长谈论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对《周易》有着精深的研究，“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据此，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是上述三种，其中并没有《通书》之名。那么，当今流传的《通书》是如何形成的呢？作为收集、整理、注解周敦颐著作的第一功臣，朱熹认为，在周敦颐的上述三种著作中，《易说》是“依经以解义”，即依据《周易》的经文逐字逐句地解释其含义，而《易通》则是“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即通论《周易》的大义而并不逐字逐句地注解。朱熹认为，《易通》即是后世所谓的《通书》，只不过何时由《易通》更名为《通书》则无从考证。

从历史上《通书》的实际流传情况来看，早在朱熹之前，南宋初年学者胡宏、祁宽等为周敦颐的著作所作的序、跋中已有《通书》之名。另外，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学者朱震在其所上《汉上易传》的《进周易表》中也说“敦颐作《通书》”。由此可见，此书至迟在北宋末南宋初已名之为《通书》。据祁宽的《通书后跋》，此书主要是在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颐两兄弟的门人弟子中流传，因而书名可能是二程兄弟或他们的弟子所更改，至于为何更名以及究竟何人所更，则早在朱熹时就无法得知了。

从现存《通书》的内容来看，其中既有对《周易》某一卦的具体解说，也有对《周易》大义的通论。因此，有人怀疑，今本《通书》可能并非当初《易通》的原貌，而是掺入了《易说》的内容。对此，冯友兰先生表示赞同，他说：“周敦颐大概对于《周易》，有专讲易卦的，这是《易说》；有通论《周易》的，这是《易通》。《易说》和《易通》的分别就像王夫之《周易内传》和《周易外传》的分别。大概这两部著作后来都残缺了，有人把剩余的部分混为一书，总名之曰《通书》。”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解释比较合理，今本《通书》可能就是在《易通》的基础上混合了《易说》的一部分内容而编成的。

《通书》共分40章，各章之间并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类似于讲稿或语录的汇编。《通书》文字简约精审，义理明白畅达，全面展现了周敦颐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哲理玄思、德性修养和施政治民三个方面，既表达了对天人宇宙的哲学思考，又探讨了士人学子的言行如何合乎圣人之道，还总结了怎样当政施治才能获得最佳

的治理效果，可以说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书。

周敦颐精通《周易》，《通书》本身就是对《周易》的解读，因而《通书》中的哲理玄思其实就是周敦颐对《周易》哲理的思考。周敦颐认为，《周易》探究了万事万物的本源，《易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意思是说乾元天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万事万物因乾元天道而得以产生、发展、变化。由乾元天道衍生出一种纯粹至善的德性，周敦颐称之为诚德，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代表的伦理原则以及人类的各种行为都是以诚德为根本遵循的。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从天道禀赋了诚德，但是只有圣人能把诚德完全地贯彻到自己的一切行为中，贤人则以圣人为榜样时时检点自己，改过迁善，努力让自己不断地恢复到纯粹至善的本来面目。

那么，士人学子如何才能恢复到诚德的本来面目呢？这就涉及德性修养的问题。首先，周敦颐认为，德性修养最重要的是“慎动”。即言行谨慎，动必得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关键就在于他的一切言行都符合诚德的要求。周敦颐说：“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士人学子以圣人为榜样，努力不停地让自己的行为达到诚德的标准，必须克制愤怒，抑制欲望，改过迁善，这样才能符合仁义中正的圣人之道。其次，周敦颐认为，德性修养还应该尊重师道，重视道德教化。每个人个体之间存在刚柔善恶的气质差异，或偏于刚，或偏于柔，很难达到中正和合。有鉴于此，圣人重视师道尊严，“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在老师的教诲引导之下让人能够“自易其恶，自至其中”。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一贯的价值追

求，士人学子加强德性修养的目的在于治国安邦。因而，周敦颐在《通书》中讲诚德，讲德性修养，最终必然指向施政治民。首先，周敦颐认为，施政治民最关键的是统治者，他说：“天下之众，本在一人。”为了实现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目的，周敦颐向统治者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用心要纯，“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二是任用贤能，“贤才辅则天下治”。其次，在具体的治理方法上，周敦颐主张重礼乐而慎刑罚。他说：“礼，理也；乐，和也。”礼的作用在于区分尊卑贵贱的政治社会秩序，乐的作用在于和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治理天下首重礼乐，用礼乐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礼乐不及之处则辅之以刑罚，但用刑必须慎重。周敦颐说：“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刑罚关乎百姓的性命，因而不可不慎，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政刑苛紊”的现实情形有感而发。

总之，周敦颐的《通书》讲德性修养，然后归之于施政治民，完全符合孔孟儒学天人贯通、内圣外王的学术理路。但是正如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任何思想都不能脱离它的时代，周敦颐的《通书》正是因为适应了宋明以来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的发展趋势，所以才会被推崇备至。



（上接1版头条）

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指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构建全过程创新链，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上取得更大进展。近年来，我们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2018年的2704.7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420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71%增长到3.26%，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4.5万家增长到6.9万家，区域创新能力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我们将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全面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重点提升“六力”、打造“六地”。一是提升创新竞争力，打造科技体制改革示范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推动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向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转变，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完善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机制，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更好激发科研单位、科研人员创造力。

二是提升创新引领力，打造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发挥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等“国之重器”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作用，深入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继续将1/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长期稳定投入机制，促进更多“从0到1”的源

头性创新成果涌现。

三是提升创新硬实力，打造关键核心技术发源地。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广东路径”，深入推进“广东强芯”工程、核心软件攻关工程，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加快打造中国集成电路第三极，努力在突破“卡脖子”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是提升创新驱动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最佳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鼓励企业建设研发机构、加大科研投入，完善高校、科研机构成果转化产业化机制，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

五是提升创新支撑力，打造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地。支持创建广东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引导天使投资加快发展，建设国际风投融资中心，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六是提升创新原动力，打造全球一流科技创新人才向往聚集地。扎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创新引才育才机制，聚焦高精尖缺大力引进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形成高端科创人才聚集效应。

坚持制造业立省,加快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广东坚持以制造业立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2018年的3.48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95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6.7万家。我们将坚持以实体

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实施产业、平台、项目、企业、环境五大提升行动，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在新的高度挺起广东现代化建设的产业“脊梁”。

一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围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大力支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开展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中下游、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支持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改。强化企业梯度培育，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实施“个转企、小升规、规转股、股上市”市场主体培育计划，今年再推动7000家以上企业“小升规”。

二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积极承接国家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实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汽车零部件产业强链工程，加快补齐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薄弱环节。下大力气抓好工业投资，推进产业链重大项目建设，依托龙头企业引进集聚一批产业链关键项目，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和自主可控。

三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壮大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等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推动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新能源等产业成为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深海空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打造若干5000亿元级产业集群。

下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积极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上接1版二条）

“大平安”理念蕴含着发展的、动态的观点，强调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抓稳定工作要见之于早、抓之于实、求之于解、化之于小，在全省各级党委建立和落实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制度，常态化分析研判风险隐患，及时解决平安建设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按照“重结果、动态性、群众评”原则，建立完善了平安绩效考评机制，每年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调整修订考核指标。不是一次考评定终身，而是每年都要翻篇归零。坚持发展的、动态的观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既要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从“大平安”理念到总体国家安全观，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大平安”理念蕴含着群众的、人民主体的观点，强调“平安不平安，群众说了算”。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紧紧扭住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平安建设最重要的实践参与者、成效评价者和成果享有者。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安全列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回答了国家安全为了谁、依靠谁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平安浙江建设决策部署，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超前的战略眼光、深邃的领导智慧、强烈的使命担当。“大平安”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脉相承，内涵同源、外延同质、路径同效、目标同向，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平安建设和国家安全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始终贯穿其中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崇高价值追求。

坚持高水平统筹,把总体国家安全观贯穿平安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对深入推进平安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人民至上，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着力构建安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新安全格局以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确保政治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网络更清朗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中国式现代化。

聚力化解政治安全风险。政治安全是最高的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生命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深化重大活动维稳安保工作经验，筑牢政治安全屏障，提高斗争本领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进一步巩固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聚力化解经济金融领域涉稳风险。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政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深入推进企业合规试点工作，持续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高度警惕预付消费费、私募基金、网贷平台、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等系统性风险，构建行刑衔接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严防经济金融风险转化为政治、社会风险。

聚力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社会稳定是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的前提。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深入开展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健全“六长直报”、重大涉稳问题挂牌督办、专班运作等维稳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化解信访突出问题；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少捕慎诉慎押”等制度机制，努力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聚力化解社会治安突出风险。社会治安是平安建设的永恒主题。要创新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和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深入开展防范化解“民转刑”案件等专项行动，切实保护人民群众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聚力化解公共安全领域重大风险。公共安全是社会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要深化“遏重大”攻坚战，全面排查整治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确保较大及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聚力化解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要健全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依法打击整治新型网络犯罪，着力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强化涉法舆论引导处置，进一步打造网络清朗空间。

坚持高效能治理,把平安建设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对社会治理进行部署。可以说，社会治理一头连着国家安全，一头连着平安稳定，社会治理是平安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的基石。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着眼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快推动县级社会治理中心与乡镇平台、村社网格全面贯通，健全事项受理、分析、流转、处置、督办反馈、考核等闭环管理机制，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县乡村三级上下联动、环环相扣、运转高效的县域社会治理格局。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要坚持以善治为目标，完善党建引领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模式，打通城乡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尤其要加强示范引领和典型实践，以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为重点，提升基层自治精度；以深化平安法治乡村建设为抓手，提升法治保障力度；以加强农村文明实践为载体，提升乡村文明程度；以反映民意、解决诉求为目的，提升村社治理温度。

强化数字化手段应用。积极运用数字化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破解基层基础设施建设难题，推进现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以现代技术打造“千里眼”“顺风耳”。融合“全域数字法院”“数字检察”“公安大脑”及平安建设各成员单位公共数据平台，加快打造平安风险监测预警防控平台，强化各类风险信息数据的全量归集、多维集成，进一步促进平安建设由经验决策向大数据决策转变。

平安建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实现平安建设人民参与、人民共享、人民评价，着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作者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